



徐亮 / 新华

港珠澳大桥/隧道系统，55 公里长

中国香港：历史的潮流

威廉·佩顿, 2020 年 7 月 2 号

【英文稿译文】

“香港人，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正被历史的潮流所困，但重新融入中国乃是一个惊人的机会。香港是历史上仅有的两个跨越世界最大鸿沟的地区之一（另一个是澳门），从世界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一部分变成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经济崛起的一部分。”

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在 2020 年 5 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起草的新国家安全法，侵犯了香港人的权利。此法律 — 七月一号生效 — 针对的罪行包括煽动叛乱、分裂

国家、恐怖主义和外国政治干预香港事务。美国威胁要通过多达三部法律，以惩罚其所谓的北京方面对香港事务的“干涉”。欧盟领导人敦促中国放弃香港新的国家安全法，否则将面临——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的话来说，是“非常消极的后果”。

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公民认为这些指控是有根据的，并相信他们的政府会支持香港的人权和民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析中英关于香港回归声明的措辞，以及其它细节，但只有在历史背景下才能很好地理解它们。

英国的大炮

18 世纪晚期，乾隆皇帝写信给乔治国王，要求英国不要在中国贩卖鸦片，但他的信没有得到回复。中国最终从顽固的英国商人手中查获了 2 万箱或 140 万公斤鸦片。伦敦方面的反应是义愤填膺，向中国派遣了军队。他们不能失去鸦片的利润，因为鸦片的利润扭转了由于日益增多的中国茶饮用量而造成的对中国的国际收支逆差。

火药和大炮都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欧洲人提高了大炮冶金技术，他们使用改进的武器打败了其发明者，赢得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1年，中国被迫签署《南京条约》，给予英国和香港各种贸易权利，甚至赔偿英国的毒品损失。

二十年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次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结盟反对中国。这一次，北京被侵占了，圆明园也被洗劫了。随后，中国被迫签订了更多的协议，把澳门租给葡萄牙，把香港租给英国，连同九龙和新界一起租给英国 99 年。

1911年，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被废黜，继而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内战。为了统一并赶走日本，内战暂停，之后又再次开始。共产党革命胜利了，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和澳门仍分别租给英国和葡萄牙，台湾仍在以蒋介石为首、美国军队支持的战败的共和军手中。

香港逐渐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贸易和金融中心，成为通往中国内地的门户。

殖民时期的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殖民时期的香港总督领导政府，指挥军队，并主持行政会议和立法会。他从精英人士中任命执行委员会成员和立法会一半的议员，另一半是政府官员。在听取意见后，总督被授权制定法律，然后再获得立法会的“同意”。截至1966年，立法会有13名政府官员及13名由总督委任的非官方议员。

到了20世纪70年代，香港和澳门的未来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英国和葡萄牙的租约即将在1997年和1999年到期。当中国明确表示不会延长租期，双方同意提前签署移交协议以便让双方放心。直到一九八四年，英国与中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后，才开始与不同团体的代表开始推行立法会民主化进程。但香港人没有投票权，也不被允许合法地示威或抗议。

与英国和葡萄牙的声明都规定，这两块领土的地方政府今后将直接向北京报告。中国宣布将实行“一国两制”。这一创举赋予前殖民地区“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包括独立的法律制度以及通过自己立法的地方政治制度。不过，中国将任命香港特首，并直接控制防务和外交事务，还将对被判定不属于香港地方管辖权的任何其它事务的立法。

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英国统治，香港和大陆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文化鸿沟。在澳门也是如此，但程度要轻一些，因为葡萄牙采取了比英国更温和的做法，促进了澳门同大陆的成功再融合。

英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在英国的统治只剩下5年的时候，他们派了一位粗暴的前任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前往香港，彭定康很快把香港的政治温度推到了沸点。1995年，对即将废除的香港宪法进行修改，允许选举立法会，包括首次直接选举部分地区的立法会议员，人数占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英国将香港交还中国之前的21个月，立法会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选举产生。这些选举与中国1990年已经通过的1997年后香港管治基本法是相冲突的。

大多数以英语为母语的发达国家的公民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给其人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记忆。在中国人所称的中国“百年耻辱”中，香港的沦陷是关键事件之一，而英国的这些最后举动只是雪上加霜。

相比之下，西方人把彭定康的努力主要看作是保证香港人拥有更自由未来的高尚尝试。英国人普遍认为，他们自己的政府风格是世界上最好的，推广这种风格是一项崇高

的事业。他们自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错误的，而他们的才是正确的。

英国最后摆出这种蔑视的姿态，也减轻了其结束曾经伟大的殖民历史带来的痛苦。当今，只有少数英国岛屿和其他地区仍属于曾经的大英帝国，包括阿根廷海岸的福克兰群岛、加拿大海岸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西班牙的海岸直布罗陀，以及塞浦路斯海岸的两个地区和其他散射加勒比海和大西洋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岛屿。

今日香港的法律基础

1997年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基础是：a)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 b) 中国政府1990年通过的《基本法》。在此基础上，有香港法律的架构，以及《基本法》附件三列出的全国法律。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仍然是中英之间的一项有效指导香港1997年回归的协议。

中英联合声明的有关条款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地区 [...] 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二、联合王国（英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英国）政府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另外：

“十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对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五十年内不变。”

《基本法》的内容如下：

第十八条：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条规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全国性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凡列于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可对列于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减，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

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添加了重点)

中英联合声明没有给予英国任何参与解释或执行作用。这只是一项关于 1997 年完全移交权力的协议。协议的执行取决于中国，中国当然应该充分尊重协议。后来通过的《基本法》完全是中国法律，不是国际协议。

有趣的是，北京方面虽然谨慎，但并不反对香港享有普选的想法：

第四十五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邓小平曾把这种渐进的政策发展描述为“摸着石头过河”。尽管中国政府对普选持开放态度，但它将静观事态发展。当然，一党制国家不希望多个政党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取而代之的是，由一个提名委员会审查候选人，然后举行普选选出一名候选人，并由常务委员会正式任命获胜者。即使在这些条件下，中国仍给予香港比英国更大程度的选举民主，包括普选权。

这种在中国用于社会、经济甚至政治发展的实验性方法，在西方也很少为人所了解。新政策通常首先在一两个城市或省份进行测试。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历史以这种实验为特征，就像对香港未来的政策一样。

不幸的是，“终极目标”这个谨慎的短语被许多人曲解为“明确的承诺”。而“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则被选择性地遗忘了。要求北京“信守承诺”一直是抗议者及其西方支持者的口号，但《基本法》和协议中的措辞明确表示，决定将取决于形势的发展。

持续动乱

进展绝对不是循序渐进的。2003 年，当香港政府试图按照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要求通过国家安全法时，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抗议，认为这样的法律会限制他们的权利，因此该法律草案被废除。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普选。2007 年，常务委员会在北京表示，计划在 2017 年实行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让香港几乎所有人都有投票权。此后，一些公开支持分裂的可能候选人让北京方面开始担心。2014 年，经过 5 个月的谘询，国务院发布了一份白皮书，指出尽管北京方面计划在香港实行普选，但反对不爱国的候选人。

和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宪法不容许将一部分领土分裂出去的途径。在世界范围内，试图分割一个国家领地大多是非法的。不久前，西班牙宣布加泰罗尼亚民选领导人被判处 100 年监禁，因为他们在 2017 年就加泰罗尼亚脱离西班牙独立举行公投。据报道，90% 的投票者支持脱离西班牙。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中国领导人公开支持西班牙分裂运动的“权利”，西班牙领导人会作何反应？

常委会随后澄清，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在2017年选举中，选民将从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提名的两至三名候选人中进行选择。活动人士敦促实行完全西方式的选举制度，他们辩称，对提名程序有太多控制。示威者走上街头进行了后来演变为“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的抗议活动，暴力活动不断升级，数月来阻塞了该市的主要交通要道。

2015年，北京方面又进行了几个月的磋商，然后公布了2017年选举的计划。计划仍与以前大致相同，即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由提名委员会以多数票提名的候选人实行普选。

此后，反对其提议社团日益加剧骚乱，中国政府保持了克制和缄默。然而，石头太滑，水流太猛。他们最终改变了主意，决定谨慎的做法是让提名委员会在2017年选举行政长官。只有立法会选举实行普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抗议演变成无控制的骚乱，其结果破坏了他们自己所寻求的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2019 年的抗议活动

抗议活动在 2019 年 6 月再次开始，这次是反对一项允许引渡到 85 个国家和中国大陆的新法律。在香港，嫌疑犯不能被引渡到这些国家。即便在这些国家中有要求香港逮捕并引渡嫌犯受审，即使被怀疑是杀人犯的人，香港也没有法律回应机制。在香港的街道上，嫌疑犯也是安全和自由的。这样的嫌疑犯同样不能被引渡到中国大陆。虽然中国被指责没有充分尊重“两制”，但很多人似乎忘记了“一国”的重要前提。

西方人和香港抗议者认为，北京方面将利用这部法律来压制异见。西方媒体经常报道持不同政见者因直言不讳而在中国被捕的故事，让人联想起了奥威尔式的中国。许多香港青年和西方人认为，北京方面打算将香港抗议者引渡到中国受审。

该草案下的引渡遵循了世界范围内使用的标准模式，包括大多数西方国家。引渡只适用于刑事犯罪，至少判处两年监禁。香港法庭必须先裁定所指称的罪行亦属香港法例下的刑事罪行。接下来，香港司法系统将单方面决定，要求提交的证据是否足以根据香港法律进行审判。只有在香港律政司司长最终批准后，嫌疑人才能被引渡。

这些详细的保护措施对抗议者和西方媒体都没有多大意义。除了少数人之外，大多数肯定还没有读过该草案，而很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该法律旨在将抗议领导人引渡到中国。这一切只是在情绪层面上才有意义，而情绪就是街头动乱的主流，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震撼着香港。

令情况更加恶化的是，许多人认为，香港铜锣湾书店(Hong Kong Causeway Bay Books)的合伙人已经被中国内地警方拘留。这家书店出售了一些指控中国领导人腐败的书籍。店长林荣基(Lam Wing-Kee)声称，他是在进入中国大陆后被捕的，他的故事在香港广泛流传。后来他搬到台湾，在那里重新开了这家书店。这些故事也会加剧人们对中国法律体系的怀疑和不信任。

香港特区政府未能及时公开解释该法案草案，这也可能加剧了示威活动。即使该法案被撤回。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并提出了五项要求：（一）撤销该法案(已经撤销了)；（二）行政长官辞职；（三）政府收回使用“骚乱”一词来描述抗议活动；（四）对警方在抗议/骚乱期间的行动进行独立调查；（五）无条件释放所有在冲突中逮捕的人。

示威活动变得越加疯狂，破坏了商店、地铁站、入侵机场，甚至洗劫了立法会的办公场所——在内墙上乱涂乱画。一个地铁站被毁，不得不关闭。商店被抢劫，购物中心内使用消防水龙带。立法会大楼的维修费用超过 5,000 万港元，铁路约 16 亿港元(约 2 亿美元)，理工大学约 7 亿港元。在几起事件中，不支持抗议的旁观者遭到严重殴打。

尽管发生了暴力事件，西方的许多政客和媒体还是为示威者们欢呼雀跃。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将香港街头的暴力形容为“美丽的风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政治处处长朱莉·伊德(Julie Eadeh)被拍到在 2019 年抗议活动期间与多位领导人会面，其中包括现年 25 岁、公开倡导香港独立的香港领导人黄之锋(Joshua Wong)。在说服美国政界人士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方面，他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有许多指控称中情局支持抗议者。

西方的这种行为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到气愤，难以接受。让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中国外交官会见并支持 2020 年 5/6 月在美国 700 多个城镇发生的示威和骚乱的领导人，美

国人会作何反应？我记得 1970 年，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援引《战争措施法》（War Measures Act）镇压支持独立的暴力抗议活动。数千名士兵被派去恢复和平，500 人被逮捕。就像香港一样，这也是英法殖民历史的后果。

新的国家安全法

2019 年的抗议活动对香港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而 2020 年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的经济损害更是雪上加霜。就在香港开始复苏的时候，2020 年年中，示威者又开始准备示威。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香港的新《国家安全法》就是这条法律。由于香港立法机关 23 年来未能通过第 18 条所强调的“其他法律”条款，这一事件受到了该条款的制约。

人们对新法律的意见分歧很大，对其细节的讨论不太可能改变许多人的想法。该法律将要求香港成立一个以香港领导人为首、由香港政府管理、但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国家安全保卫委员会。在司法机关裁定嫌疑人有罪之前，法律将会保障无罪推定，而司法机关在多数情况下将由香港普通市民组成的陪审团做出裁决。

北京方面还将在香港设立一个国家安全保卫办公室，负责收集和分析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信息。《基本法》规定，少数案件可由内地当局审理，特别是涉及国防或外交事务(包括外国干涉)的案件。

在2019年，极端暴乱使香港陷入瘫痪，分裂香港的野心日益高涨，北京方面感到必须通过《国家安全法》，以帮助防止不稳定和叛乱的进一步恶化升级。相比之下，北京没有担心澳门，因为澳门地区早就通过了澳门《基本法》所要求的这样一项国家安全法。外国对香港骚乱的支持和煽动引起了北京的特别关注，香港骚乱性质已成为国家安全问题。事实上，没有任何国家允许其领土的一部分不受国家安全法的保护。

自然很多香港人希望获得更强有力的投票，但也很少有人希望回到2019年的混乱局

面。人们对新的国家安全法意见不一。但仅在新国家安全法宣布几周内，就有290多万人签署了一份支持新国家安全法的请愿书。尽管如此，民意调查发现，同样有不少的人反对这项法律。香港特区政府应该花足够的精力和耐心来诠释该法律及其保障措施。通过回答问题，甚至是棘手问题，帮助香港居民了解国安法的真谛。

历史的潮流来了

在今天这个发微博的世界里，很多西方媒体眼光短浅。然而，要了解香港今天发生的事件，历史是非常重要的。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已有20多年，国家期待着美好的未来。耗资190亿美元、连接香港与珠江三角洲两岸、终场于澳门的新桥和隧道建设已竣工并投入使用。这座桥/隧道/人工岛系统长55公里，无论从物理意义还是隐喻意义上来说，都是“地球上最长的跨海工程”。

1984年，中国真诚地跟英国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逐步缩小150多年来大陆和香港这个殖民地区之间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差距，计划用50年的时间有条不紊地慢慢重新融合。但是，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

并没有放弃再次分离香港的希望，声称自己干预和怂恿香港的动荡是正确的。

很多香港人，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正被历史的潮流所困，但重新融入中国仍然是一个惊人的机会。与澳门一道，香港是历史上仅有的两个跨越世界最大鸿沟的地区之一。香港已经从世界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一部分变成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经济崛起的一部分。它仍然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重要桥梁。地球上很少有地方既讲汉语又讲英语。很少有金融中心能与香港的金融服务业匹敌。香港的年轻一代无需逆流而上，这一不可避免的潮流会给香港带来很多红利。

加拿大人 Dr William M. Paton (威廉·佩顿博士) 曾任联合国在刚果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和索马里的国别代表；全球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国别方案主任；国际发展法律组织副总干事；联合国移民机构负责非洲和中东事务的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国际灾害研究项目主任(临时代理)。他现居住于北京。欢迎您将意见发送到 billpaton@qq.com。